

殷墟王陵区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与背景

井中伟

关键词: 殷墟 陵墓 盗掘坑 商周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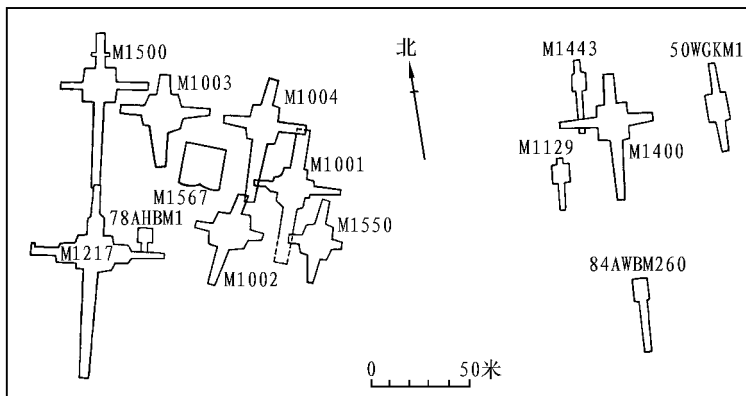
KEYWORDS: Yinxu Mausoleums Grave Robbing Tunnels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BSTRACT: The 14 mausoleums in the Xibeigang royal mausoleum precinct at Anyang, Henan are all robbed for many times, the earlier ones of which were the most severe; almost all of the grave goods in the chambers were sacked away.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es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xcavation reports to the early robbing tunnels revealed that these robbing tunnels have clear features of simultaneity. This large-scale robbing activities to these royal mausoleums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the Zhou peop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might have been related to the historic fact of Duke Zhou's eastward expedition against Wugeng's rebellion.

西北冈位于安阳市西北郊武官村和侯家庄北,是殷代王陵区的所在地,大墓分东西两区(图一)。西区有四条墓道的大墓 7 座(HPKM 1001、M 1002、M 1003、M 1004、M 1217、M 1500、M 1550),一条墓道的大墓 1 座(78AHBM 1)以及未完成的大墓 1 座(HPKM 1567,有墓坑但没有墓道,考古学界俗称“假大墓”)。东区有四条墓道的大墓 1 座(HPKM 1400),两条墓道的大墓 3 座(HPK M 1443、M 1129 和 50WGKM 1),一条墓道的大墓 1 座(84AWBM 260)。

据杨锡璋先生研究,在上述 8 座带四条墓道的大墓中, M 1001、M 1550 和 M 1400

属于殷墟二期, M 1004、M 1002、M 1500 和 M 1217 属于殷墟三期, M 1003 属于殷墟四期,它们是从武丁到帝乙八位商王的陵墓^[1]。其中可以确认 M 1003 是帝乙的陵墓,因为殷墟四期与帝乙、帝辛相对应,而文献记载帝辛亡国自焚于鹿台,并未葬入王陵区, M 1567 可能



图一 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大墓分布图

作者: 井中伟, 长春市, 13001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78(总 174) •

考 古

是为帝辛而造的陵墓,由于“武征商”^[2]这样重大的突发性历史事件而中断未成。此外,殷墟二期的3座大墓与武丁、祖庚和祖甲相吻合,殷墟三期的4座大墓与廩辛、康丁、武乙和文丁相吻合,但由于墓内随葬品被盗严重而难以准确判定它们与商王的对应关系,部分学者推测M1001可能为武丁之陵^[3];对此也有学者持否定意见,认为该墓“年代约相当于武丁早期”,墓主“应是早于武丁的一位殷王”^[4]。另3座带两条墓道和2座带一条墓道大墓的年代大体上均为殷墟二期,它们的规模较小,等级低于王陵,其墓主可能是商王的配偶或其他高级贵族^[5]。

笔者基本赞同杨锡璋先生的研究成果,同时无意纠缠于悬而未决的墓主判定问题。由于它们屡遭盗掘,绝大多数随葬品已不复存在,墓主身份可能会成为永远的谜。本文旨在考察殷墟西北冈大墓上所谓“早期盗掘坑”(或称“古代盗坑”)的发生年代,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找寻其发生的历史原因。

一、早期盗掘坑的共时性特征

西北冈王陵区14座大墓均遭到多次盗掘,其中以早期盗掘坑的破坏最为严重,以致有些墓室内的随葬品几乎被洗劫一空,所剩遗物极少。下面我们根据发掘报告的描述,对各大墓上早期盗掘坑的特征作一番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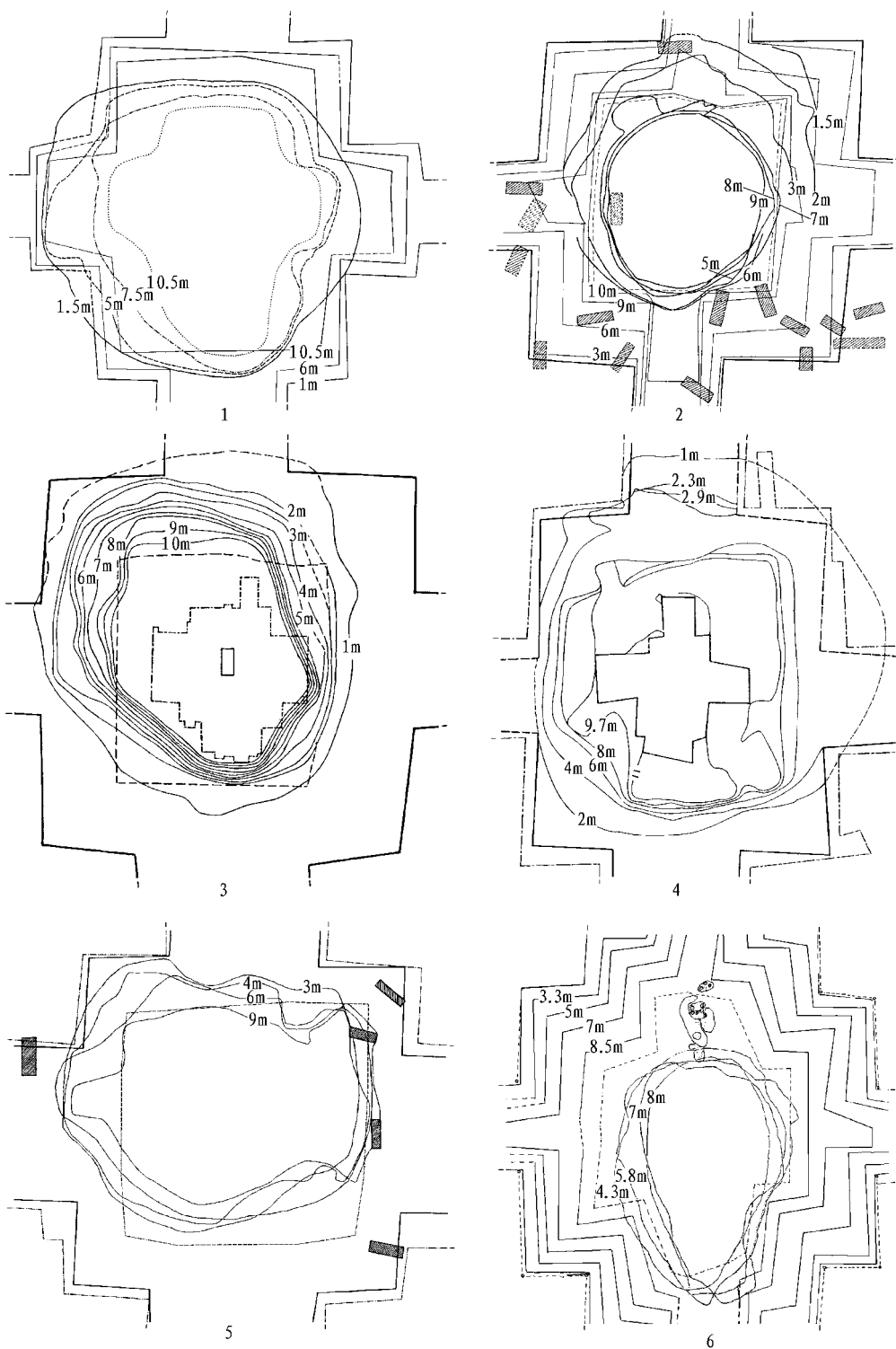
HPKM1001 早期盗掘坑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坑口直径约20多米,恰好覆盖墓室上层。在地面以下1米深处,坑面收缩为东西直径17.5米、南北直径16.4米,西南、西北边缘超出墓室范围。向下至5米深处,坑面东西两侧略呈耳状,长径约15.9米。再向下,其东缘向内收缩较大,东耳形逐渐消失。至7.5米深处,收缩成东西直径约13.3米、南北直径约15.3米的不规则圆形。此时深度已至椁室顶面,盗掘坑遂沿椁室外侧下掘,直达墓室底部。另外,在该墓上还发现了

23个近代盗掘坑^[6](图二,1)。

HPKM1002 早期盗掘坑平面呈较规则的圆形,上口微偏在墓坑北部,东西直径约16米,南北直径约17米。至地面以下约5米深处,向南正移恰在墓室中心,并且向下直径逐渐缩小。但至地面以下10米深处,又突然扩大至东西直径约10米、南北直径约10.3米,直达墓底。因盗掘坑位于正中部位,墓壁未受损伤,但所存留的未被扰动的部分很小。早期盗掘者不但盗取了墓中所有器物,还把椁室底板以上的结构全部拆毁。另外,20余个长方形近代盗掘坑多数分布于墓室南部^[7](图二,2)。

HPKM1003 早期盗掘坑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地面以下约1.5米深处,坑面南北径约17.5米、东西径约15.5米。至地面以下10.9米深处,坑面收缩成南北径约10.9米、东西径约9.2米,此深度已达墓底。该盗掘坑虽然由上向下逐渐缩小,但在地面以下约7.5~8米深处,西北部分又向外扩大(图二,3)。该墓南墓道和西墓道早期也被盗掘,南墓道上的盗掘坑平面为不规则的长方形,口大底小,口南北长约7米、东西宽约6.5米,底南北长约6.8米、东西宽约5.4米。西墓道上的盗掘坑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口较底稍大,东西长约1.6米、南北宽约0.9米。尽管这两个早期盗掘坑形制较为特殊,但发掘者根据坑内扰土和遗物分布情形判定它们与墓室上的大盗掘坑“当是同时挖掘的”。此外,在该墓上和附近还发现66个长方形近代盗掘坑,绝大多数长约1.8~2.5米、平均宽约0.6米,深度参差不齐,对墓葬的破坏程度非常有限^[8]。

HPKM1004 早期盗掘坑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地面以下约1米深处,坑面南北径约21米、东西径约18米余。至地面以下9.7米深处,坑面南北径约13米、东西径约10米;至地面以下11米深处,始大致循椁室之轮廓下掘到地面以下12.35米,深于墓



图二 殷墟西北冈大墓上的早期盗掘坑

1. HPKM 1001 2. HPKM 1002 3. HPKM 1003 4. HPKM 1004 5. HPKM 1217 6. HPKM 1400

底 0.35 米(图二, 4)。南墓道上有一长方形盗掘坑,“地面以下二公尺始现,上层约八公寸是乱灰土,深 2.8 米以下才出乱夯土。土的情形和土中遗物大体跟墓坑中的早盗坑相同”。另有 2 个平面呈四边形的盗掘坑均打破墓室上的早期盗掘坑,但它们在坑内土的凝固程度、开口深度和形制大小等方面又明显不同于该墓上发现的 53 个长方形近代盗掘坑^[9]。

HPKM 1217 早期盗掘坑平面为不规则椭圆形,地面以下约 3 米深处始露出坑口,东西径约 16.6 米、南北径约 14 米;至地面以下 9 米深处,东西径约 15 米(加上向西侧凸出部分约 17.3 米)、南北径约 11 米。由口至底,中心点由微偏于墓室西北逐渐移向东南,径渐缩减,直达墓室底部。此外,在该墓上还发现了 10 个长方形近代盗掘坑^[10](图二, 5)。

HPKM 1400 早期盗掘坑平面呈南北长的椭圆形,中心点略偏于墓室中心点之南。地面以下约 1.6 米深处露出坑口,至 2 米深处现出全部轮廓。自 1.5 米深处向下至 9 米深处,盗掘坑面积没有显著缩减,而墓室面积收缩颇多,所以盗掘坑相对墓室面积的比例向下逐渐增加。如此,盗掘者不必挖掘大量不含器物的夯土而能盗取墓中全部遗物(图二, 6)。此外,在该墓上的“近代盗掘坑颇不少,北部尤多。但损伤及墓坑壁、墓道壁底之处不多”^[11]。

HPKM 1500 早期盗掘坑上口平面呈不规则的弧边三角形,偏于墓室东部,边长约 17 米,东边中部有一宽约 3.5 米、向东墓道伸入约 1.5 米的凸出部分。由口到底,盗掘坑平面形状逐渐变圆,但东面之凸出部分到地面以下 10 米才突然消减。地面以下 10.3 米至潜水面,但据在水面以下所钻的探洞推测,盗掘坑当直达墓底。此外,该墓上还发现 10 个长方形近代盗掘坑,它们“对墓之损伤极微,且毫无所获”^[12](图三,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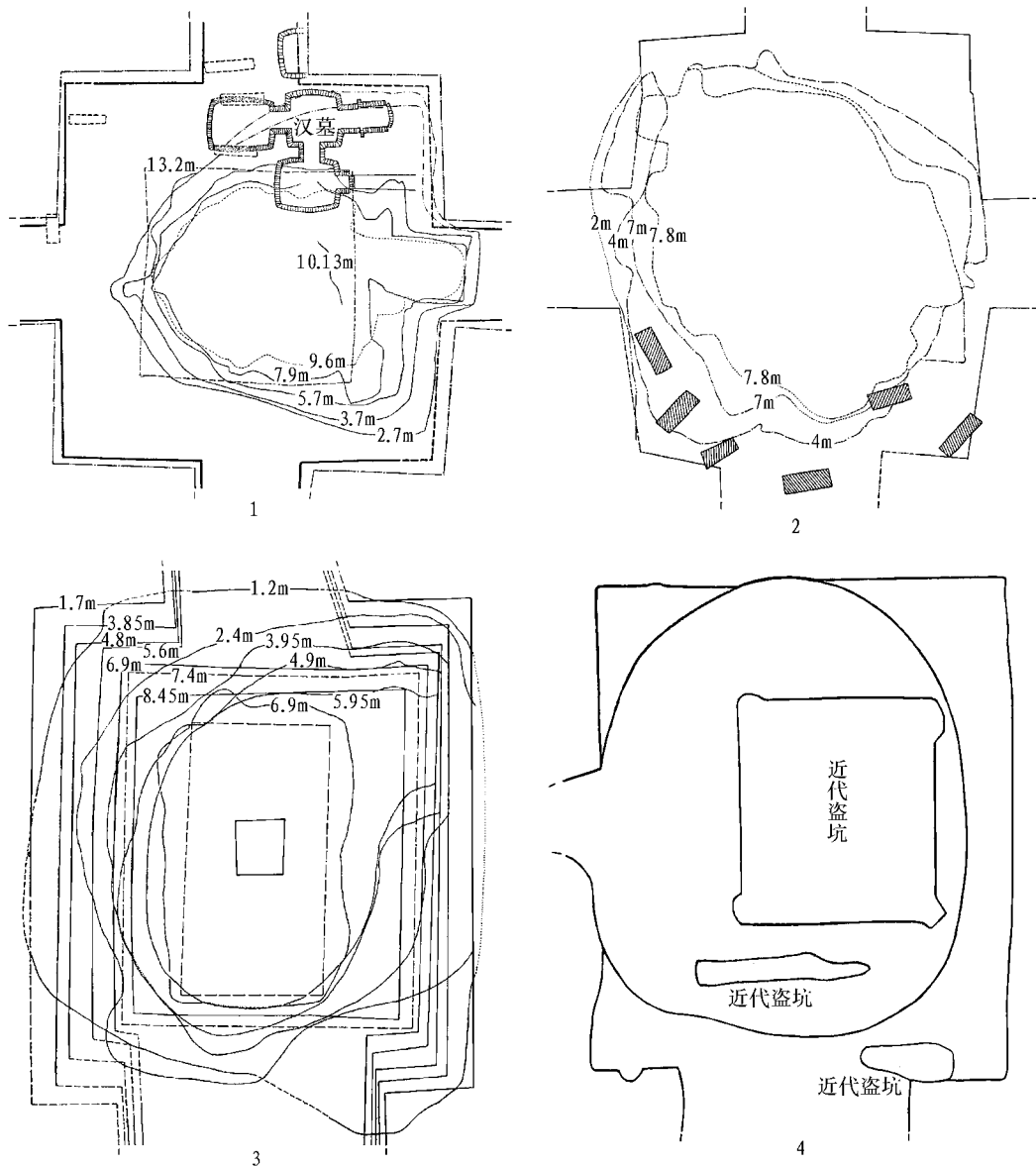
HPKM 1550 早期盗掘坑平面呈不规则圆形,西侧超出墓室范围。至地面以下 2 米深处,墓坑的轮廓才大致现出;至 4 米深处,坑壁还不能连接不断;而西壁北段的大部由口到底全部被破坏无遗。此外,在该墓上还发现了 15 个长方形近代盗掘坑^[13](图三, 2)。

HPKM 1443 早期盗掘坑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地面以下 1.2 米深处始现清楚的边缘,南北径 7.6 米、东西径 7 米,全部在墓坑范围之内。自 1.2 米深处以下,2.4 米、3.95 米、4.9 米、5.95 米深处的形状愈加不规则,东北部顺墓室东壁北段下挖,没有伤及壁面。至 6.9 米深处,盗掘坑形状变得颇为规则,南北径 4.75 米、东西径 2.5 米,恰好覆盖椁室全部。自 6.9 米深处以下,坑壁大致垂直,至 7.4 米深处,达椁室顶面,即转折依椁室四壁直下至墓室底。此外,在该墓上还发现了 12 个近代盗掘坑,“平面皆长方形,长两公尺左右,宽约六公寸,上下大致垂直,到底时有向一方或四周掏挖的现象”^[14](图三, 3)。

HPKM 1129 早期盗掘坑平面呈圆形,坑口直径约 7 米左右,自上而下直径逐渐缩小,墓葬被全部盗毁,出自早期盗掘坑内的遗物数量极少且残碎不堪^[15]。

50WKGM 1 早期盗掘坑位于椁室正顶上而微偏西,呈不规则圆形,上口直径约 6 米左右。盗掘者达到椁室上层,将盗掘坑缩小,紧依椁室西壁而下,盗后又放火将棺椁焚烧。由于棺椁木质好,火势强劲,以致椁壁外夯土被烧红到 20 厘米厚,椁室内残余器物多化为灰烬。“此次盗掘后,重行填好,不知又历若干年,所填的土,因自然压力,土质已变坚实”。此外,在该墓上还发现 5 个长方形近代盗掘坑,垂直下挖,遇到墓壁或遗物则随之横掘,坑内扰土甚疏松^[16]。

78AHBM 1 早期盗掘坑位于墓室中部偏北,上口近圆形,向下逐渐扩大,呈不规



图三 殷墟西北冈大墓上的早期盗掘坑
1. HPM 1500 2. HPM 1550 3. HPM 1443 4. 84AWBM 260

则形，近墓底处扩及整个墓室。在距地表 5.8 米深处，普遍出现一层厚 0.1 米左右的黑色圆形木炭层，墓室东西两壁及底部也有木炭，表明经早期盗掘后棺槨又被焚烧。墓主和殉人及动物的骨骼被严重扰乱，盗掘坑内出土殷代晚期及西周陶片，未发现近代瓷片。此外，在该墓上还发现 5 个长方形近代盗掘坑，其中墓室上有 2 个，南墓道上有 3

个，坑内出土近代瓷片等^[17]。

84AWBM 260 早期盗掘坑位于墓室中部，平面呈较规则的圆形，直径 7.4~8.9 米，开口于墓口上的唐宋文化层下，打破商文化层。它破坏了整个墓室，深及椁底，毁坏了椁盖、部分椁壁及整个棺。盗掘坑内为扰乱的夯土，其内夹杂大量红漆皮、木炭、零星兽骨、人骨、碎陶片及小件器物。此外，在该

墓上还发现 5 个长方形近代盗掘坑, 其中墓室上的 2 个均打破早期盗掘坑, 另 3 个位于南墓道上, 均开口于耕土层下, 盗掘坑内填土松软, 多见近代砖块、瓷片、铁丝和蜡烛头等^[18](图三, 4)。

以 M 1001 早期盗掘坑为例, 坑内出土的遗物上层较少, 愈往下愈多, 至地面以下 8.5~10 米深处即椁室处, 出土遗物最多。在盗掘坑内所出残碎遗物中, 有几件曾在西北冈其他大墓的早期盗掘坑内发现它们缺失的部分, 彼此可以拼合在一起, 如同一件白陶的 6 块碎片分别出自 M 1001 早期盗掘坑 4.2 米、4.4 米深处以及 M 1004 早期盗掘坑 2.8 米深处(图四, 1); 同一件石磬的 7 块碎片分别出于 M 1001 早期盗掘坑 9.4 米、10 米深处, M 1004 早期盗掘坑 2.8 米深处以及 M 1550 早期盗掘坑 9.1~9.4 米深处(图四, 2); 同一件硬陶罐的 2 块残片分别出于 M 1001 早期盗掘坑 3.7 米深处和 M 1567 中^[19](图四, 3)。

归纳以上各大墓早期盗掘坑的特点, 我们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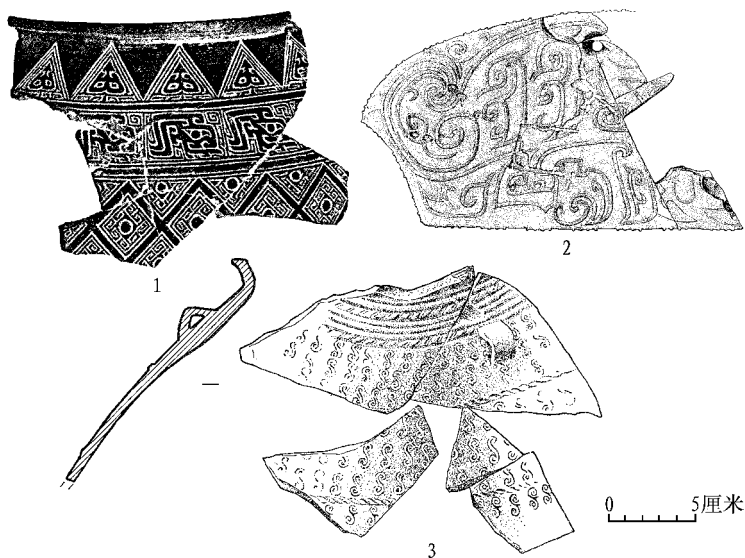
其一, 早期盗掘坑的开口层位较深, 一般在地表以下 1~3 米深处才露出坑口, 坑

内填土由于受自然压力已变得相当坚实, 这不同于开口于地表、且填土甚疏松的近代盗掘坑, 表明各大墓被早期盗掘的时间比较久远。

其二, 早期盗掘坑的盗掘手法不同于近代盗掘坑。后者出于省工省时且掩人耳目的需要, 一般呈面积窄小的长方形, 挖掘位置的选择比较盲目且深浅不一。而早期盗掘坑基本位于墓室中部, 即使坑口略有偏斜, 向下仍能移至墓室正中。平面一般呈内切状的不规则圆形或椭圆形, 坑边紧贴墓室四壁(局部或略超出), 大都依墓壁自上而下逐渐收缩, 直达椁顶。另外, 部分有随葬品的墓道也被盗。这说明早期盗掘者对大墓的所在位置与形制了如指掌, 无需探寻而能准确掘入; 而且坑口几乎占满墓室, 深度直达墓底, 要挖掘如此大规模的土方量, 显然非偷偷摸摸的少数人所能为。

其三, 由于当时棺椁保存尚好, 故早期盗掘者可以循椁室四壁下掘, 把室内之物洗劫一空, 将墓主和殉人及殉牲的骨骼严重扰乱, 最后再将棺椁木架拆毁或放火焚烧。这说明早期盗掘的时间与大墓埋葬的时间间隔不会太长, 早期盗掘者不仅要攫取墓中随葬的宝器, 而且是带着充满敌意的报复心理将包括尸骸在内的墓室所有毁坏殆尽。

其四, 早期盗掘坑内出土的遗物下层多, 上层少, 且不同盗掘坑出土的部分遗物残片彼此可以拼合, 说明它们被同时开掘时, 上层墓土堆放在下、下层墓土与毁弃器物堆放在上, 及时回填时, 已被扰动的墓土又大致复归。由于墓土就近堆放或回填得很草率, 以至于同一件器物的残片被随意散



图四 出自早期盗掘坑的器物残片
1. 白陶 2. 石磬 3. 硬陶罐

弃在不同的盗掘坑内。

综合上述四点,笔者认为西北冈大墓上的早期盗掘坑具有明显的共时性特征,这种在较短时间内所进行的如此浩大的“工程”,应是由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的,并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

据目前所知,除西北冈王陵区外,在殷墟其他墓地发现的带两条或一条墓道的大墓也同样遭到早期盗掘。

在后冈墓地,1933年发掘一座带两条墓道的大墓,该墓曾被盗掘两次,早期的圆形大盗掘坑差不多是方形墓室的内切圆,直达墓底,墓室随葬品被一扫而光。有随葬品的南墓道早期也被盗掘,而仅埋人头但无随葬品的北墓道则未被盗。由此发掘者推断早期盗掘的时间很可能“距埋葬之后很近,其上尚有标记存在,或者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不然不能挖掘的那样准确”。第二次盗掘发生在当年考古发掘暂停时,为不引人注意,盗掘坑的规模很小,共2个,均呈长方形^[20](图五,1)。1971年发掘的35座殷墓,“被盗窃的多达25座,除少数是被早期盗掘的以外,绝大多数是在解放前被盗的”。其中带两条墓道的M48“经古代和现代两次盗掘,墓室全部被翻乱,连腰坑也未能幸免。随葬器物被盗一空,殉葬人的遗骸也都被扰乱”。另一座带两条墓道的M32和带一条墓道的M47也完全被盗窃,墓内随葬品被洗劫一空,仅残余少许木器的痕迹和用于镶嵌的牙片^[21]。1991年发掘的带两条墓道的M9和M12均遭到多次盗掘。M9“墓室上有4个椭圆形古代盗坑和3个长方形近代盗坑”,“椁室被盗空,不见棺木”,“南墓道上有3个圆形古代盗坑和4个长方形近代盗坑,北墓道靠近墓室处有1个长方形近代盗坑”(图五,3)。M12“受到的破坏更为惨重,整个墓室上有一圆形盗坑,南墓道有二个长方形盗坑,北墓道有一个长方形盗坑”,“椁内被盗

空,不见椁木、棺木”^[22](图五,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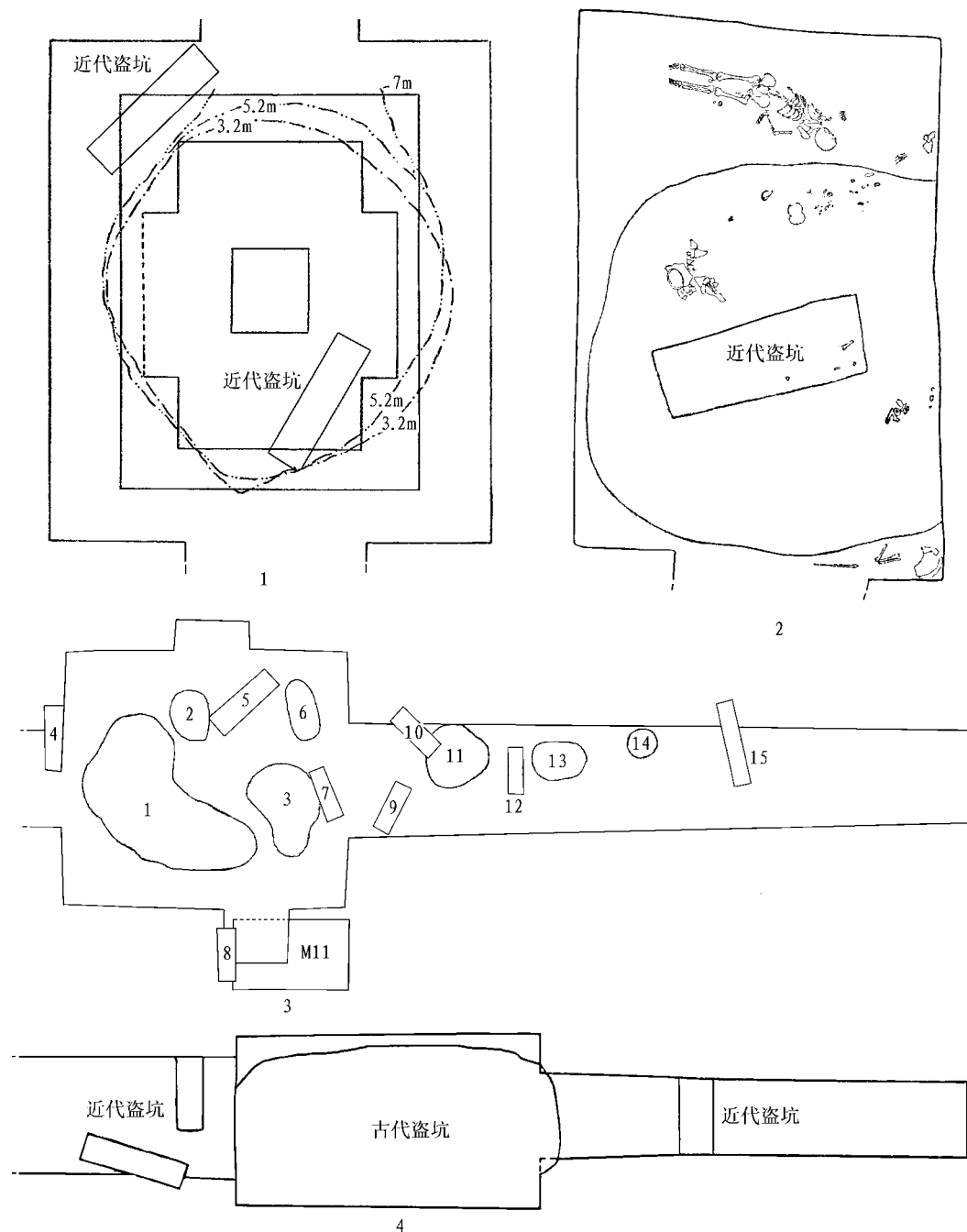
在殷墟西区墓地,已发掘10座带墓道的大墓,它们都被数次盗掘。1969~1977年发掘的5座大墓均带一条墓道,其中M93的“盗坑在墓室中央”,M701墓室“发现古代盗坑一个,近代盗坑二个,破坏殆尽”^[23](图五,2),另3座墓被盗的具体情况未作报道。1979年后发掘的5座大墓,其中已公布的M765“墓室及墓道上有7个盗坑,墓室上为一古代的圆形大盗坑,墓道上为近代的长方形盗坑,破坏严重,故残留物极少”^[24]。

由上可知,后冈和殷墟西区大墓上的早期盗掘坑的规模和盗掘手法与西北冈大墓上的基本相同,表明它们早期被盗掘的时间相同。此外,在大司空村东南^[25]、刘家庄北地^[26]等地发现的带墓道的大墓亦遭多次严重盗掘,遗憾的是,被盗详情未作公布,其中可能包含与上述同时的早期圆形或椭圆形大盗掘坑。

二、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

既然我们已知西北冈、后冈和殷墟西区各大墓上的早期盗掘坑具有明显的共时性特征,那么它们究竟发生于何时?石璋如先生根据盗掘者对大墓所在位置了如指掌、棺椁尚未腐朽等信息推测,早期盗掘发生的时间“距埋葬之后很近”,但“肯定年代不得而知”^[27]。高去寻先生也推断说,它们应“比殷人亡国的年月还要晚一段时期”,然而具体年代“还不能确定”^[28]。后来杨宝成和杨锡璋两位先生发掘84AWBM260时,曾指出早期盗掘的时间“约在商末周初”^[29],却未提供断代依据。其实,根据目前已发表的资料,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是可以判定的。

首先,依据两组层位关系,即HPKM1500的早期盗掘坑的北部被一座汉代砖室墓(M1569)打破^[30],84AWBM260的早期盗掘坑开口于墓口上的唐宋文化层下并打破商文化层可知,早期盗掘坑的相对年代



图五 殷墟后冈与西区大墓上的早期盗掘坑

1. 后冈 1933 年发掘大墓 2. 殷墟西区 M 701 3. 后冈 9IM 9 4. 后冈 9IM 12

上限不早于商末, 下限不晚于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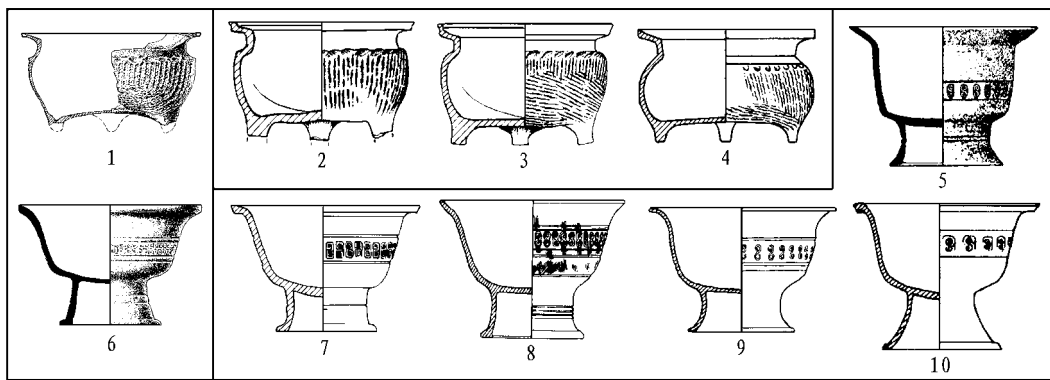
其次, 各大墓早期盗掘坑内出土遗物尽管残碎不堪, 但仍能看出它们绝大多数为殷商器形, 当是被扰动的墓中随葬品, 依据它们只能判定墓葬的年代。然而根据 HPK

第 2 期

M 1004、M 1003 和 M 1001 的早期盗掘坑内出土的少数典型器物, 则基本可判定早期盗掘坑的绝对年代。

据报道, 在 HPKM 1004 的早期盗掘坑中, 距地面 3.5 米深处出土 1 件陶鬲, 虽残

• 85(总 181) •



图六 HPKM 1004早期盗掘坑出土陶鬲、簋与西周同类器比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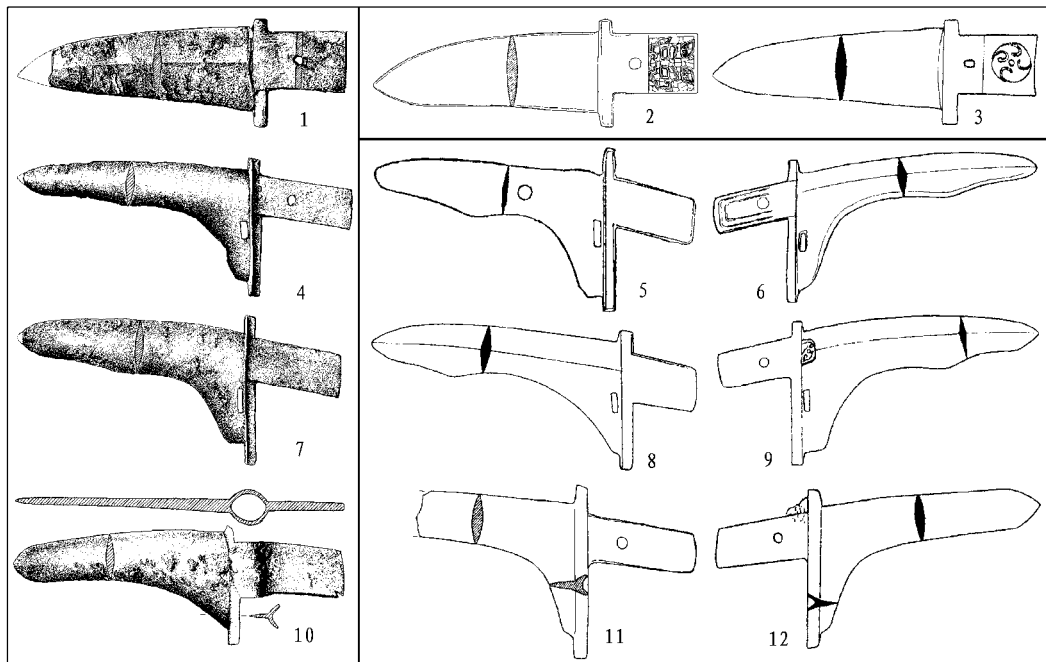
1、6. HPKM 1004: R1785Q, 3: 3113 2、3、7. 安阳刘家庄北 M 97: 3、M 104: 6、M 104: 9 4. 洛阳北窑 M 93: 4
5. 长安客省庄 KM 69: 2 8、9. 长安张家坡 M 137: 010、M 398: 1 10. 洛阳中州东路 C3M 200: 4

存小半个，但基本可复原^[31]。该器为宽折沿，短颈，凸肩，联裆近平，实足根残缺，肩部有一周压印花边纹，腹部饰粗绳纹（图六，1）。它与安阳刘家庄北 M 97 和 M 140^[32]以及洛阳北窑 M 93^[33]出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图六，2~ 4）。此种鬲虽为周式联裆，但盘形口、宽扁体的造型却具有明显的殷鬲遗风，年代应为西周早期。此外，在 M 1004 西墓道翻土中距地面 4.8 米深处，还出土 1 件陶簋，侈口，方唇，斜腹，高圈足，腹部饰弦纹，间以竖向“S”形纹（图六，6），与之形制相似的陶簋还见于安阳刘家庄北 M 104、洛阳中州东路 C3M 200^[34]、长安客省庄 KM 69^[35]、张家坡 M 137 和 M 398^[36]等（图六，5、7~ 10）。这种“S”形纹簋是由商式的半球腹簋发展而来的，属典型的周式簋，它存在着腹部由浅变深、腹底间转折趋于明显、圈足外撇程度逐渐加大的演变趋势。相比较而言，M 1004 西墓道翻土中所出陶簋的年代亦当属西周早期。

在 HPKM 1003 的早期盗掘坑内出土 7 件铜戈，其中保存完好的 5 件有胡戈出土深度一致且距离紧邻，另 2 件无胡戈出土深度不详且其中之一残缺严重^[37]。从器形上看，无胡戈的内前段有明显的槽，并且位于援本上部，具有显著的商代晚期风格，是典型的商式戈（图七，1~ 3）。而在 5 件有胡戈中，

除 1 件微胡有銎外，其余 4 件均为短胡一穿，它们与目前所见的晚商有胡戈存在着明显的形制差异，如援上刃外拱，下刃有波折，援身虽上扬但前部略下勾，侧阑发达等，而这些却是西周早期铜戈的典型特征（图七，4~ 9）。尤其是那件有銎戈，其阑部靠内侧作竖向凹槽用以包，这种设计目前仅见于西周戈上^[38]（图七，10~ 12）。因此，我们认为这 5 件有胡戈应属周式戈，其年代约为西周早期。

在 HPKM 1001 的早期盗掘坑内出土的铜镞也值得注意。在 29 件铜镞中有 28 件具有三角形双翼且前后锋均尖锐的特征，为典型的商式镞（图八，1、2）。仅 1 件（R 7580）为条形双翼，前鋒较圆钝，后鋒则平齐（图八，3）。此型铜镞在殷墟考古中极为少见，虽然在安阳白家坟遗址也曾发现过 1 件（VET 12③：4），却出自唐宋扰乱地层之中^[39]。研究表明，这种条形双翼且后鋒平齐（部分双翼不等长）的铜镞在西周铜镞中占主体，比例高达 77%，被视为“周人的文化因素”而被称为“周式镞”，其形制的演变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双刃的弧度逐渐增大，翼内侧向内凹进越来越深，使条形翼越来越长”^[40]（图八，4~ 6）。由此看来，在 HPKM 1001 的早期盗掘坑内出土的 R 7580 号镞很可能为周式镞，其年代也约为西周早期。



图七 HPKM 1003 早期盗掘坑出土铜戈与晚商及西周铜戈比较图

1、4、7、10. HPKM 1003: R6780、R6778、R4784、R6783 2. 妇好墓 771 号 3. 安阳武官村 M 259: 3 5. 房山琉璃河 II M 205: 84 6、8、9. 天马—曲村 M 6372: 2、M 6128: 1、M 6179: 7 11. 长安张家坡 M 244: 7 12. 曲沃北赵 M 33: 340 (3. 采自《考古学报》1987 年第 1 期, 12. 采自《文物》1995 年第 7 期, 其余采自各考古发掘报告)

此外, 在 78AHBM 1 的早期盗掘坑内还出土西周陶片, 遗憾的是, 发掘者并未公布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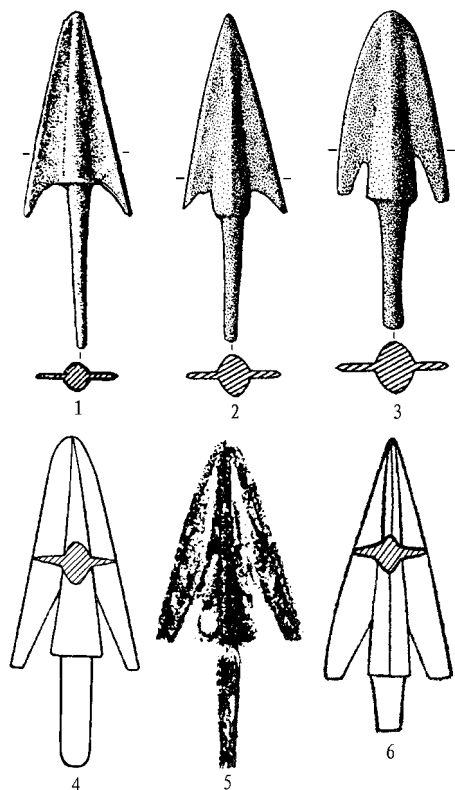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判定, 殷墟西北冈大墓上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约当西周早期。正如在西北冈 M 1001 的近代盗掘坑中发现“一柄盗掘者遗留在土中的步枪刺刀”^[41]一样, 在 HPKM 1004、M 1003 和 M 1001 的早期盗掘坑中出土的周式陶鬲、簋和铜戈、镞并非该墓的随葬品, 而很可能是西周早期周人对其大肆盗掘时所无意遗留其中的。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 西北冈 M 1004 上 2 个平面呈四边形的盗掘坑的年代问题。从层位关系上看, 它们均打破墓室上的西周早期椭圆形大盗掘坑, 发掘者根据它们的开口深度、坑内填土的凝固程度和形制大小等情况认为, “其挖掘当在早盗坑之后相当的时期”, 同时它们在诸方面又明显不同于在该墓上发现的长方形近代盗掘坑, 二者“绝不

会混为一谈”, 指出“早期盗掘之后, 近代盗掘之前, 这座墓似乎曾经过另一次的盗掘”, “至于确切的时代, 因坑中没有出可作指南的东西, 所以无法判定”^[42]。据文献记载, 在北宋元丰年间, 安阳一带常发生殷墓随葬的铜器被盗掘的事件^[43]。1982~1992 年, 在安阳郭家庄西南地发掘的 191 座殷墓中有 77 座被盗, 发掘者认为它们的被盗时间主要集中在宋代和近现代, 其中 M 280 就被宋人盗过, 墓中还留下一盏黑花白瓷灯^[44]。若据此推测, 西北冈 M 1004 上的两个平面呈四边形的盗掘坑则很可能是宋人所为。

三、早期盗掘坑的发生背景

既然已知以西北冈王陵区为中心的殷墟带墓道大墓早在西周早期就被周人洗劫一空,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周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翻检先秦典籍, 根本不见周人盗掘殷墓的记载, 然而根据文献所反映西周初年的历



图八 HPKM 1001 早期盗掘坑出土铜钺与西周铜钺比较图

1~3. HPKM 1001: R7562, R7567, R7580 4. 宝鸡高庙村 GM5: 1 5. 县辛村 M18: 4 6. 房山琉璃河 I M1: 5 (4. 采自《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 3 期, 5、6. 分别采自考古发掘报告)

史背景,笔者推断周人大肆盗掘殷商大墓的行为很可能与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叛乱的史实有关。

史书记载武王伐纣仅用时一个月,“小邦周”^[45]灭亡“大邦殷”^[46],取而代之成为天下共主。但以“小邦周”自己的力量,一夜之间要全面接管“大邦殷”数世累积之王业,特别是顽固的殷遗复辟势力仍相当强大,附殷的东夷诸国也尚未归顺,实在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为了巩固新生的姬周政权,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尤其封纣子武庚于殷都“以续殷祀”^[47],推行“以殷治殷”之策,其目的在于争取殷遗贵族的合作和安抚殷民之心。这种政治上的妥协,既是形势所迫,也是新得天下的周初统治者

力求稳定的需要^[48]。当然,为防范殷遗势力复辟,武王还封管叔、蔡叔于殷都附近以“监武庚”。基于上述时势,特别是纣子武庚与殷民仍居留原地,殷商王室陵墓自然能够被保护,而绝不会被大规模发掘。关于这一点,从考古学方面也能得到验证,即殷墟文化第四期最末阶段的部分遗存,尽管文化属性仍可归于商文化,但其年代已进入西周初年,如殷墟西区 M1713 的下葬时间当在纣王帝辛之后的“武庚监国”时期^[49]。

武王克殷后“天下未宁而崩”,时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后,作为武王次弟、深怀“践祚”野心的管叔极为不满,于是“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50],造谣中伤周公,并勾结武庚,公然发动叛乱,一些殷遗贵族和附殷诸国也趁机煽动武庚复辟。一时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姬周王朝面临着“若涉渊水”^[51]的严峻形势。值此国难当头、生死存亡之际,周公力主镇压,在“内弭父兄,外抚诸侯”^[52]使平叛认识达成一致后,遂兴师东征。为了完成武王临终前提出的“我图夷兹殷”^[53]之遗志,实现姬周天下“大一统”的局面,周公不仅对管、蔡“大义灭亲”,尤其对以武庚为首的殷遗复辟势力进行了坚决的军事镇压,杀戮应是异常惨烈的^[54]。

平定武庚叛乱后,周人将土很可能有预谋、有组织地大肆发掘了殷王室和顽固贵族的大墓,不仅尽取随葬的宝器,还将墓主尸骸扰乱,拆毁棺槨或付之一炬,这对殷遗复辟势力的认祖归宗心理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表面上看来这是对武庚叛乱的惩罚,更深的目的则是要“以绝殷祀”。毕竟这种做法不太光彩,有损于当权者周公的伟大形象,故史官们对此避而不书。然而与之类似的“剖棺、戮(或焚、鞭)尸”的“发墓”行为在后世还是时有发生,它不同于以单纯搜求财富为目的的普通盗墓,其根本动机就是要通过这种极其有力的手段惩罚敌对方,实现心理征服与“厌气破势”之政治目的^[55]。

除了大规模掘毁殷商大墓,周公还将各“族”殷遗民分迁到由周王室成员直接控辖的卫、洛邑、鲁等地,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自此殷都彻底荒废成墟^[56]。至于封微子启于宋,以“代殷,奉其先祀”^[57],只不过是安抚殷遗民情绪的怀柔策略罢了。

附记:本文承蒙林 先生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该研究成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2009JJD780004)和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资助。

注 释

- [1] 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商代的墓地制度》,《考古》1983年第10期;《关于殷墟初期王陵问题》,《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 [2] 参见利簋铭文。
- [3] a. V. Kane, A Re-examination of An- yang Archaeology, *Arc Orientalis* 10, 1975.
b. 曹定云:《论殷墟侯家庄 1001 号墓主》,《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c. 谷飞:《殷墟王陵问题之再考察》,《考古》1994年第10期。
- [4] 郑振香:《侯家庄 1001 号大墓的年代与相关问题》,见《揖芬集——张政 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 [5] 如 84A WBM 260 的墓主可能是武丁或祖甲的配偶(杨锡璋、杨宝成:《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第1期), 50W GKM 1 的墓主可能是武丁的配偶妣癸(曹定云:《殷墟武官村大墓墓主试探》,《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
- [6]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册第1~3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7]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第1、7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
- [8]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第3~4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
- [9]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第1~3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 [10]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

墓》第2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

- [11]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九本·1129、1400、1443号大墓》第21、24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
- [12]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七本·1500号大墓》第2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
- [13]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八本·1550号大墓》第1~2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
- [14]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九本·1129、1400、1443号大墓》第91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
- [15]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九本·1129、1400、1443号大墓》第7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
- [16] 郭宝钧:《一九五 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殷墟 259、260 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 [19]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册第73~74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20] 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
- [2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27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0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33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 [26] 杨锡璋、刘一曼:《1980年以来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见《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 [27] 同[20]。
- [28] 高去寻：《殷代墓葬已有墓冢说》，《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41期，1980年。
- [29] 同[18]。
- [30]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七本·1500号大墓》第6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
- [31]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第165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 [3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第63~64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3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郊发现的两座西周墓》，《文物》1992年第3期。
- [3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第122页，文物出版社，1962年。
-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第111~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37]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第123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
- [38] 井中伟：《先秦时期青铜戈·戟研究》第54~56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13、170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 [40] 石岩：《中国北方先秦时期青铜镞研究》第59~60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 [41]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册第3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42]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第2~3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 [43] 如（宋）罗泌《路史·国名记四》提到商王河亶甲塚在安阳县城外西北隅，罗苹注云：“元丰七年水毁，民夷之，有铜器，冶之。又有黄堆者，后墓”。另在（元）乃贤《河朔访古记》中也有相似的记载。
-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 [45] 《尚书·大诰》。
- [46] 《尚书·召诰》。
- [47] 《史记·殷本纪》。
- [48] 郭伟川：《周公称王与周初礼治——〈尚书·周书〉与〈逸周书〉新探》，见《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实论集》第192~19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 [49] 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见《三代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04年。
- [50] 《尚书·金縢》。
- [51] 同[45]。
- [52] 《逸周书·作雒》。
- [53] 《逸周书·度邑》。
- [54] 史载管、蔡与武庚的命运，或言“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逸周书·作雒》），或言“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史记·管蔡世家》）。
- [55] 王子今：《中国盗墓史》第48~55、228~242页，九州出版社，2007年。
- [56] 张之：《殷都何时成为废墟》，《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 [57] 《史记·宋微子世家》。

（责任编辑 洪 石）